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一

先周文化探索

雷兴山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一

先周文化探索

雷兴山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K871.34

L0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周文化探索/雷兴山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03-026722-1

I. ①先… II. ①雷…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周代
IV. ①K224.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9408 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刘 能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0 1/4

印数: 1—1 200 字数: 452 000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先周文化探索》读后的若干思考

李伯谦

自 1933 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徐旭生先生率队在陕西西部进行考古调查、1934 ~ 1935 年苏秉琦先生在调查基础上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以来，从考古学上探索先周文化，迄今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近 80 年来，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围绕与此相关问题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诸如丰镐、周原、碾子坡、周公庙等遗址的发掘及其重要发现，不断推进并加深着先周文化探索课题的进展。徐旭生、苏秉琦、石璋如、邹衡、徐锡台、胡谦盈、张长寿、尹盛平、任周方、卢连成、张忠培、王克林、刘军社、梁星彭、孙华、徐天进、张天恩、李峰、王占奎、徐良高、王巍、牛世山、雷兴山、张翠莲、孙周勇、种建荣以及日本学者饭岛武次、西江清高等先生所撰写的调查、发掘报告或论著，就是这一课题进展的记录，而我们即将翻开的新的一页，即是现在摆在我案头的雷兴山先生的专著《先周文化探索》一书。

一

雷兴山从 1991 年开始发掘麟游蔡家河、史家塬、园子坪遗址，至今仍活跃在与寻找先周文化有关的考古调查、发掘工地上。在麟游发掘时，他还是一个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黑发青年；在周原发掘时，好像刚刚有了一丝白发；而如今，到周公庙遗址发掘现场参观见到他的同行好友，无不为他仍然满面红光但却已满头黑白参半的花白头发表而感到惊奇。他的确付出了很多，但也的确有了不少收获。在他这部凝结着他十多年心血的著作里，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1) 清晰地梳理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先周文化的历程，对前辈学者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探索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提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先周文化的思路和技术路线；

(2) 依据新的思路和技术路线，在对诸相关遗址居址、墓葬分期分段基础上，提出了与探索先周文化相关遗存五期 10 段的分期体系，树立起了统一的年代分期标尺；

(3) 在对周公庙甲骨坑 H45 等单位个案分析基础上，总结提出了区分先周单位与西周单位的判断标准；

(4) 依据新的思路和研究路线，在分期基础上通过居址、墓葬的横向比较，提出了与探索先周文化相关遗存的分类体系，即存在有商文化京当型、郑家坡文化、碾子坡文化、孙家类型以及“沔西类”居址遗存、“西村类”墓葬遗存、“刘家一类”墓葬遗

存等。

以上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新的比较系统、完备的分期体系和分类体系的得出，是从考古学上参与先周文化探索的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雷兴山的整合工作无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二

相关遗存的分期与分类，是族属研究的基础。但共同的基础，不见得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大家知道，在分期、分类问题上，诸家意见虽有小的差别，但并无根本的不同。可是要问何种考古学遗存是先周文化，观点却南辕北辙，针锋相对。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雷兴山反思的结果，认为是在探索何种考古学遗存是先周文化时使用的“追溯法”和“都邑法”存在问题。他说“无论是‘都邑法’和‘追溯法’，还是其他判断考古学文化族属的方法，虽在一般情况下皆有其有效性与合理性，但或因使用条件不完全具备，或因仅立足于‘陶器本位’或‘文化本位’而致使这些方法尚存不够周密之处”。因此，他呼吁“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而有关聚落考古的研究尚很薄弱的情况下，以后有关族属判断等相关研究，应由以往的‘器物本位’，转变为‘背景本位’”。他所说的“背景”，是“考古背景”，“主要是指相关考古学遗存所处的聚落特征，包括区域聚落形态、单个聚落的聚落结构与聚落性质、聚落内各功能区的特征与性质、单个堆积单位的属性等”。他的批评是对的，他的呼吁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对此，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

其实，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是由特定的研究目的决定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也都是有条件的。所谓的“追溯法”、“都邑法”，最初似乎都不是为研究族属问题而选用的。“追溯法”惯常用于文化谱系研究，由山东龙山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到北辛文化谱系的建立；由河南龙山文化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到仰韶文化谱系的建立；尤其是邹衡先生从殷墟晚商文化到郑州二里冈早商文化谱系的建立，主要都是采用了“追溯法”。“都邑法”成功运用的实例，是邹衡先生郑州商城为商汤亳都的考订和夏、商分界标尺的建立，它原本只是为确定夏文化寻找一个定点而已。在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研究上，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几乎已是学界的共识，回顾这一研究过程，主要是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分布地域、文化特征、文化关系及其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几个方面与文献中有关夏族的记载比较研究而得出的，并非主要运用“追溯法”、“都邑法”的结果。可见研究方法再好，也不宜赋予它过多的功能，当你对它期望过高，而实际上它又难以达到，这时候回过头来把责任都归罪于它，不仅于事无补，也是不公平的。

我想借此机会提出来讨论的也正在于此：在先周文化探索方法上，是否也有类似情况呢？与此相关，为要探索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要求将“器物本位”、“文化本位”转变为“考古背景本位”的提法，也要秉持慎重的态度。考古学上的器物，是考古遗存

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其出土数量大，形制变化比较敏感，是研究考古学上许多问题尤其是分期、谱系问题的重要材料，但也必须看到，它毕竟只是遗存的一部分，什么都由器物出发，什么都以“器物本位”，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文化”，我们这里说的是考古学文化，就不一样了。按照夏鼐先生的定义，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间范围、特定地域范围内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的总和，考古学研究，无论是分期、谱系、社会结构、聚落形态、文化变迁、文化关系乃至居民的组成及其族属等，都必须由“文化”（整体或部分）出发，以考古学文化为本位，因为以上所列各项研究，无一能离开考古学文化。所谓“考古背景”，并非固定的概念，而且涉及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在一定范围内它可说是考古背景，但换了一个场合，它可能就成了需要研究的问题的本身。实际上，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的转换和范围大小的变化，以上所列各项是可以互为背景的，考古学文化族属的研究，当然和被视为考古背景的聚落形态、聚落结构、聚落性质等研究有密切关系，这几个方面研究清楚了，肯定有助于族属问题的解决，但要说这些所谓“考古背景”的研究是解决族属的关键，恐怕就得考虑考虑了。

三

那么，解决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研读雷兴山先生的《先周文化探索》，从其字里行间悟到，关键应该就在于，在相关考古学遗存的分期、分类体系确立之后，在考古学文化反映的聚落形态、聚落结构、聚落性质等所谓“考古背景”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如何将这些考古学研究成果与文献有关该族的记载进行科学整合了。法国历史学家 Christopher Hawkes 先生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史前、原史、历史三个阶段。所谓史前，是指漫长的、没有文字的原始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所谓原史，是指文字正在或已经发明，但还没有成系统的文字记载的历史，那种由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或初期国家阶段，大体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相对应；所谓历史，是指一般从考古学上早期铁器时代开始的、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的成文历史时代。中国考古学上的夏商周考古、先商文化研究、先周文化研究，都属于原史时代考古的范畴，刘文锁、吴晓筠对中国的原史时代都有过很好的界定和讨论。原史时代考古的重要特点，是要将有关文献记载与考古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所谓文献记载，主要不是当时的实录，而是后人的追记，有的追记可能是根据历代口耳相传的传说形成文字的，就难免杂有荒诞不稽的杜撰，因此使用这些文献之前，就必须经过可信性研究，看看哪些是前者，哪些是后者，从而决定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可用的可信度是多少，又怎么去使用。我们主张将考古与文献科学的整合，既包括事先对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也包括在使用时如何正确处理考古与文献的关系。在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一些敏锐的学者即试图将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去研究古史，但多是以文献为主，将考古材料作为注脚，结果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根据长期的研究实践，现在大家都已体会到，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文献

记载为线索，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文献所记作出判断。但需要说明的是，学者当中，由于对文献和考古材料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即使研究过程无懈可击，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见仁见智是常有的事情。以先周文化探索为例，现在的几位研究大家，在相关遗存分期、分类体系上是基本一致的，在将考古与文献整合研究所用方法上，也挑不出明显的毛病，但除了共同认定商文化京当型不是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是羌戎族文化之外，其他几类遗存的主人究竟何者是姬姓周人，认识远未统一，碾子坡文化是先周文化、郑家坡文化是先周文化两大主张仍然相持不下。雷兴山先生原来是郑家坡文化为先周文化的拥护者，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在对“沔西类”居址遗存、“西村类”墓葬遗存、“孙家类型”等作出新的定位，并比较它们之间以及与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之间的异同之后，转而支持碾子坡文化为先周文化的意见。以上基于新材料和新分析提出来的不同的新见解，既标志着先周文化探索的新进展、新收获，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先周文化探索的艰巨性、复杂性，很难说哪一种观点绝对正确，哪一种观点绝对错误。雷兴山先生在关中西部跋山涉水、摸爬滚打十多年，深知其中的深浅，他对经过倾心分析研究作出的新判断，肯定是满怀信心的，但他在这几种不同观点面前，也仅说自己的观点是诸种选项中的一项而已。我相信这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而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同意并支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四

学术研究没有止境，对整个学术事业而言是如此，对某一个学术问题而言也是如此。先周文化探索虽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收获，但正如雷兴山先生在其新著结语中所言，包括他的充满新意的论断在内，也“仅仅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他列出了包括填补关中西部龙山时代至商代二里冈上层考古学文化上的空白，“豳”地文化谱系的完善，“豳地以及漆水河下游、丰镐、周原等区域聚落形态、结构、性质研究的深入等 4 个方面。对先周文化研究而言，这 4 个方面无疑都很重要，但我觉得这是应该分出层次的，确认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先周文化是一个层次，然后研究其发展过程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回答相当于周族何位先公先王时期周族开始向文明国家阶段转化，并最终灭掉商朝是又一个层次，把研究目的有别、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尽管该涉及的问题可能都涉及了，结论也都有了，但却难以给人一个十分明晰的印象。

我虽对先周文化研究有兴趣，1991 年为响应和配合邹衡先生的先周文化课题还专门安排当时是硕士研究生的雷兴山、牛世山到麟游、武功实习，发掘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遗址，但我始终未涉足此领域，因此对先周文化很难有什么具体的真知灼见。如果从对今后研究的角度出发，除了上面的一些议论，还想围绕族属与文化研究有关问题提些建议。

周的始祖名弃，约与唐、虞同时，其母为有邰氏女，活动地域大体在今武功一带。

周灭商之前，从弃至文王，共有 15 代（实际当然应该更多）。而自不窋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贬戎狄之俗，均生活于戎狄部落之中。不窋所奔的戎狄在今何处，无从考证，庆节所居的豳，文献多指在今之旬邑。如果以文献所记为线索，我想，考古学在以下方面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1）在今武功及周临地区，针对龙山时代遗存做些工作，看其文化面貌与不窋所奔戎狄部落、庆节所居豳地（亦属戎狄范围）龙山时代的戎狄文化面貌有何异同。

（2）漆、沮、梁山、岐下的大体方位是清楚的，古公亶父与商王廪辛、康丁大体同时的推定是基本取得共识的。针对约当殷墟三期古公亶父迁岐前后漆、沮、梁山、岐山南、北文化异同做些工作。以多数学者认同的岐下即周原为例，在关中西部统一考古分期的第一、二期时，周原分布的是年代下限约在殷墟二期的商文化京当型遗存，第三期即相当殷墟三期的古公亶父迁岐时期，周原突然出现的是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碾子坡文化遗存。如果此时漆、沮、梁山、岐山以北也是碾子坡文化，那么即可证明，至少古公亶父迁岐之初，周人（也不排除尚有其他族人）使用的仍然是未“贬戎狄之俗”的戎狄文化。如果确是如此，是否将碾子坡文化视为戎狄族文化更符合实际，周人只是使用了戎狄文化而已？

（3）文化与族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不能不加分析的否定两个不同的族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个考古学文化，亦不能不加分析的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一个考古学文化只能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族，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仍以周原为例，依据新的分期、分类研究成果，在统一分期的第三期后段即第 6b 段时，周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以礼村 H8 为代表的遗存兴起，它既含有此前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碾子坡类遗存因素，也含有以联裆鬲为代表的郑家坡文化因素。对这一变化作出怎样解释，是否应从多角度考虑？参考文献所记，有无可能是古公亶父“贬戎狄之俗”出现的变化呢？如确实如此，那么礼村 H8 居址以及“西村类墓葬”、“沔西类居址”等具有自己共同特点的遗存，是否才应该称作真正的先周（或以周族为主体）文化呢？

（4）聚落形态、聚落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其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性质变化，回答周人及其相关周族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化过程。根据新的分期体系，在其第三期约当古公迁岐之时，聚落形态及结构似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其第五期即约当文王迁丰前后，不少人认为已进入国家阶段。那么，重点是否是对第四期即约当王季之时的遗存多加分析，并作出回答呢？这是先周文化探索不能回避的。

先周文化探索是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雷兴山先生的工作和成果推进了先周文化研究，达到了又一新的高度。我没有倾向性的意见，我的上述议论，只是想在此基础上为先周文化探索再加一把推力，因为即使取得了如此重要成果，但结论还远未统一。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后谁再做先周文化研究，都不能绕开《先周文化探索》这部书，同意书中的论断，需作出新的论证；不同意书中的论断，更需下大力气进行反驳，这是意料之中的。

阅读这些报告和论著，每每令我对他们执着的、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和学风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他们取得的收获和成绩感到骄傲和高兴。但是，时至今日，在何种考古学遗存是先周文化、先周文化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姬姓周人与先周文化关系等问题上，仍然是歧见纷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里既有材料尚不够充分的问题，也有理论、方法方面的问题。通过调查、发掘获得新的材料，特别是关键地点、关键时段的材料，当然重要，但理论、方法上的问题更不能忽视，假如在理论上理解不一，在方法上做不到无懈可击，尽管大家依据的是同样的材料，但得出来的结论却可能完全不同。回顾先周文化的探索历程，参看雷兴山即将出版的《先周文化探索》一书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就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目 录

《先周文化探索》读后的若干思考	李伯谦 (i)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与方法	(1)
第一节 20 世纪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历程	(1)
第二节 20 世纪先周文化探索方法之反思	(14)
第三节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考古新资料与研究成果	(24)
第四节 研究目的及相关说明	(29)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32)
第二章 相关居址遗存的分期与分类	(38)
第一节 各重点遗址居址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38)
一、周原遗址居址遗存	(39)
二、蔡家河遗址居址遗存	(63)
三、丰镐遗址居址遗存	(65)
四、壹家堡遗址商代与周初居址遗存	(66)
五、园子坪遗址居址遗存	(69)
六、周公庙遗址商末周初居址遗存	(71)
七、孔头沟遗址商末周初居址遗存	(76)
八、史家塬遗址居址遗存	(80)
九、孙家遗址居址遗存	(82)
一〇、断泾遗址居址遗存	(83)
一一、碾子坡遗址居址遗存	(89)
一二、纸坊头遗址居址遗存	(92)
一三、朱马嘴遗址居址遗存	(93)
一四、岸底遗址商代与西周初期居址遗存	(97)
一五、郑家坡遗址商代与西周初期居址遗存	(100)

第二节 相关居址遗存的分期体系与年代关系	(105)
一、典型器类的演变特征	(105)
二、关中西部地区西周初期考古学遗存的判断	(125)
三、相关居址遗存的分期体系与年代关系	(147)
第三节 相关居址遗存的分类	(158)
一、相关居址遗存相同阶段内的类别	(158)
二、不同阶段诸类居址遗存关系的初步分析	(165)
第三章 相关墓葬遗存的分期与分类	(168)
第一节 各重点遗址相关墓葬遗存的分期、年代与特征	(168)
一、周原遗址墓葬遗存	(168)
二、宝鸡市区附近的墓葬遗存	(185)
三、北吕墓地商末周初墓葬	(194)
四、漆水河下游黄家河遗址及其他遗址的墓葬	(197)
五、凤翔西村商末周初墓葬	(199)
六、长武碾子坡墓葬遗存	(203)
七、其他相关墓葬遗存	(207)
第二节 各重点遗址相关墓葬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	(211)
第三节 相关墓葬遗存的分类	(215)
一、关于墓葬遗存分类方法的讨论	(215)
二、相关墓葬遗存相同阶段内的分类	(217)
三、不同阶段诸类墓葬遗存关系的初步判断	(222)
四、诸类墓葬遗存与诸类居址遗存关系的初步分析	(224)
第四章 先周文化辨析	(228)
第一节 丰镐遗址相关遗存与先周文化探索	(228)
一、如何区分丰镐遗址商末与周初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229)
二、“侈口分裆鬲”的来源及其在探索先周文化中的作用	(233)
三、丰镐遗址商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探索	(236)
四、关于“丰镐遗址西周早期遗存为探索先周文化基点”的认识	(237)

第二节 周原遗址商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关系辨析	(238)
一、研究背景	(238)
二、第一期遗存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240)
三、第二期各段遗存的类别归属及相互关系	(241)
四、关于刘家墓地族属的认识	(246)
五、由周原陶文“周”论周原遗址的性质与先周文化	(250)
六、关于辨识周原遗址先周文化遗存的讨论	(261)
第三节 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探索	(266)
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概述	(266)
二、商周时期聚落性质的初步判断	(269)
三、商周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探索	(273)
第四节 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探索	(275)
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与聚落性质	(275)
二、商末周初遗存与先周文化探索	(281)
第五节 周原地区商周时期区域聚落形态与先周文化探索	(284)
一、区域聚落形态的初步认识	(284)
二、区域聚落形态与先周文化探索	(290)
第六节 各类考古学遗存与先周文化关系辨析	(291)
一、周原地区古公亶父迁岐后的先周文化的判断	(292)
二、周原地区以外的碾子坡文化的族属	(293)
三、“刘家一类墓葬遗存”的族属	(295)
四、“郑家坡文化”与“孙家类型”的族属	(296)
第五章 结语	(300)
第一节 主要结论及其学术意义	(300)
第二节 进一步探索先周文化的几个问题	(301)
后记	(304)

插图目录

图一 关中地区商周时期相关典型遗址位置示意图	(39)
图二 周原遗址商时期遗存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41)
图三 周原遗址商时期居址遗存陶器分期图 (一)	(43)
图四 周原遗址商时期居址遗存陶器分期图 (二)	(45)
图五 周原遗址商时期居址遗存陶器分期图 (三)	(50)
图六 周原遗址商时期居址遗存第一期陶器	(52)
图七 周原遗址商时期居址遗存第二期第3段陶器	(54)
图八 周原遗址商时期居址遗存第二期第4段与第5段陶器	(54)
图九 周原遗址 H35 等单位、第6段、西周早期典型器类特征对比图	(55)
图一〇 周原遗址居址遗存第一期与商文化陶器分期年代特征对比图	(61)
图一一 蔡家河遗址居址遗存典型陶器分期图	(64)
图一二 沔西 H18 与马王村 H11 陶器特征对比图	(66)
图一三 壹家堡遗址第二期与第四期陶器对比图	(68)
图一四 园子坪遗址居址陶器	(70)
图一五 周公庙遗址商末周初居址陶器分期图	(73)
图一六 孔头沟遗址商末周初居址陶器分期图	(78)
图一七 史家塬遗址居址遗存典型陶器	(81)
图一八 孙家遗址居址遗存典型陶器	(84)
图一九 断径遗址第Ⅰ区居址陶器	(86)
图二〇 断径遗址第Ⅱ区居址陶器	(87)
图二一 碾子坡遗址与殷墟遗址陶器	(91)
图二二 纸坊头遗址居址遗存典型陶器	(93)
图二三 朱马嘴居址部分单位年代的判断	(94)
图二四 朱马嘴遗址居址典型陶器分期图	(96)
图二五 岸底遗址相关居址遗存典型单位陶器分期图	(98)
图二六 郑家坡遗址部分具有直接层位关系的陶器	(101)
图二七 郑家坡居址商代与西周初期居址遗存典型陶器分期图	(104)

图二八	相关居址遗存中典型器类分期图（一）	（110）
图二九	相关居址遗存中典型器类分期图（二）	（115）
图三〇	相关居址遗存中典型器类分期图（三）	（117）
图三一	相关居址遗存中典型器类分期图（四）	（122）
图三二	周公庙 H45 等 5 单位与周原遗址先周晚期、西周早期典型器类特征对比图	（128）
图三三	横绳纹鬲形制分析与年代判断	（133）
图三四	袁家崖墓葬随葬品与西周时期遗物	（139）
图三五	郑家坡文化早期与“京当型”商文化典型陶器年代特征对比图	（157）
图三六	周原遗址刘家墓地分期图	（172）
图三七	周原遗址刘家墓地墓葬偏洞室墓形制图	（174）
图三八	王家嘴遗址墓葬平面分布示意图	（175）
图三九	周原遗址王家嘴墓葬分期图	（177）
图四〇	周原遗址贺家墓地第一期陶器	（180）
图四一	周原遗址贺家墓地第二期墓葬陶器图	（182）
图四二	周原遗址贺家墓地 1963 年发掘区墓葬平面图	（184）
图四三	宝鸡市高家村与苟家岭墓地分期图	（186）
图四四	高家村墓葬形制图	（187）
图四五	斗鸡台墓葬分期图	（190）
图四六	宝鸡市附近部分墓葬分期图	（193）
图四七	黄家河遗址墓葬陶器	（198）
图四八	柴家嘴遗址采集陶器	（199）
图四九	西村墓地商时期陶器	（201）
图五〇	碾子坡墓葬分期图	（204）
图五一	碾子坡墓葬平面图	（206）
图五二	壹家堡墓葬随葬品	（207）
图五三	扶风白龙墓葬随葬品	（209）
图五四	甘肃崇信于家湾墓葬随葬品	（210）
图五五	断泾遗址墓葬分期图	（211）
图五六	周原遗址凤雏宫殿基址发掘区出土陶文	（253）
图五七	周原遗址礼村与齐家北发掘地点出土陶文及共存陶器	（255）
图五八	商周时期与陶文“周”相关文字的特征对比图	（256）

插 表 目 录

表一	周原遗址商时期陶器型式统计表	(58)
表二	典型遗址相关居址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表	(148)
表三	相关居址遗存的分类	(158)
表四	典型遗址相关墓葬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表	(212)
表五	相关墓葬遗存的分类	(217)
表六	周原遗址晚商时期居址与墓葬遗存分类表	(243)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与方法

本章在全面梳理 20 世纪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总结先周文化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当前现状。在反思以往研究方法后，根据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制定本文具体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20 世纪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历程

考古学探索先周文化的过程有近 80 年的历史，若主要以考古资料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为标志，这一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20 世纪 30、40 年代

先周文化探索之肇始，可以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陕西的考古工作作为标志。此次工作的目的“只限于周民族和秦民族之初期文化，及与之有直接关系之各问题”，拟先调查，而后“侧重于民居遗址的发掘，而发掘遗址，又注重于此民族之各都邑及其附近”^②。1933 年，徐旭生先生率队在陕西长安、兴平、凤翔、宝鸡等县进行考古调查^③。在此基础上，由苏秉琦先生主持，于 1934 ~ 1935 年对宝鸡斗鸡台沟东区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一批“瓦鬲墓”。苏先生将之分为“初、中、晚”三期^④。后人对斗鸡台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

① 本文各阶段的划分，并无绝对的具体年代之界，注重把考古材料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文章归在一起，写作安排与常规研究回顾或述评类文章略有差别。

② 《史学研究所工作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五周年工作报告》，1934 年 9 月 9 日印。

③ 徐炳昶、常惠：《陕西调查古迹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4 卷 6 期。

④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 年北平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1954 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⑤ 如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 298 页，文物出版社，1980 年）中云：“苏先生又认为‘折足瓦鬲……至此期（衡按：指瓦鬲墓中期）末叶已发展成为颇近周式铜鬲的形态’（《斗鸡台》，页 277）。不言而喻，瓦鬲墓初、中期自然属于先周文化的范畴了。苏先生在该报告中虽然没有如此明说，实际上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暗示。我们认为，苏先生的这个暗示是很重要的，它为我们继续探索先周文化开辟了一条可寻的途径。”张忠培先生将苏先生的工作作为中国考古学史分期的六个标志之一，认为这是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运用现已日益被广泛采用的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也是在中国第一次根据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多篇文章，科学出版社，1999 年）。

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先生在陕西长安、武功、旬邑、彬县、扶风、岐山等地勘察，重点是传说中的周都。但此次调查所获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商周时期遗物罕见^①。

这两项工作的思路很接近：以传说中的周都为重点，试图通过调查与发掘，由其都邑而论其民族文化，进而把考古与历史联系起来。这一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合理性，以后很多先周文化的探索工作也遵循了这条途径。但在当时，周都位置不能得到具体指证，文化遗存的年代无法明确，周文化面貌尚且不知，先周文化更无从判断。所以这一时期对先周文化的研究也只能提出一些假说，大多缺乏有力的论证^②。即使如此，本阶段的工作至今仍对先周文化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

本阶段有关先周文化的遗存仅有零星发现，但与其有密切关联的西周考古则收获颇丰，这些发现主要集中于丰镐和周原两遗址。

1951年由苏秉琦先生领导的沔河流域调查和试掘^③，辨认出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西周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这一认识与尚处于辨认周文化面貌的第一阶段相比，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之后，丰镐遗址的工作仅在“文革”期间有过短暂的停顿^④。重要的发现有：195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长安普渡村发掘的西周墓，被学术界视为西周中期的一个重要年代标尺^⑤。1955~1957年，在沔西张家坡和客省庄的大规模发掘，其成果《沔西发掘报告》^⑥将居址分为两期，墓葬分为五期。1961~1962年，发掘者将沔东白家庄、洛水村所获居址遗存分为三期^⑦。1967年在张家坡又发掘一批墓

① 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年。石氏在此文中认为：“历史上早期的都城，是从事考古工作最理想的出发点”。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1956年。

② 石璋如在其《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一文中认为：（粗绳纹鬲）“可能与早期周代文化无关”，（拍纹陶）“与周代的文化也许有相当的关系”，“很显然的彩陶与周代文化可能有关系”。他在接受徐中舒先生的意见后说：“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周人虽然不是彩陶的创造者，很可能是彩陶文化的使用者。”

③ 考古研究所陕西调查发掘团：《1951年陕西考古调查工作简报》，《科学通报》2卷9期。

④ 详情可参见胡谦盈《丰、镐考古三十年（1951~1981年）的回顾》一文（《文物》1982年10期），本文仅简略介绍与西周文化分期和先周文化遗存有关之概况。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本文未说明处，均属他们的工作。

⑤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1962年长安沔东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